

顧頡剛與錢玄同

林 慶 彰*

關鍵詞：顧頡剛 錢玄同 經今古文學 古史辨

一、前 言

從近代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顧頡剛（1893-1980）是位考辨古代文獻的史學家。他花費一生的精力在考辨古代的典籍，如就經學來說，經書本是聖人之書，經學是聖人之學，在古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顧頡剛卻亟力剝去加在經書上的外衣，想回復經書的原始面貌。在顧氏和師友的努力推動下，經書逐漸失去它的神聖性，祇不過是一堆未經整理的上古史料而已。如從古代史的角度來觀察，他提出「古史層累說」，認為古代史中的人物事蹟，是經過歷代層層累積而成，要了解古代史的真面目，就應將層層的包裹褪去。他這一說法在近代學術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到現在仍餘波盪漾。

錢玄同（1887-1939）在大家的印象裏，是位國語運動的推動者，然細究他的一生，除推動國語運動外，他也是當時提倡文學革命的一員大將，又因為他既師事古文學家章太炎，又師事今文學家崔適，所以他能徹底了解今古文學的優劣點及其侷限，認為應打破經今古文學的藩籬，重新來審視經學。他認為

* 本所研究員。

辨偽，辨「偽事」比辨「偽書」更重要，偽事即指古書所述不合理的事蹟，這就指導了當時古史考辨運動的方向。

顧頡剛與錢玄同各有其專注的學術領域，他們間的學問有否交集？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說：「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樵）、姚（際恆）、崔（述）三人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啓發和幫助。」^①可見，顧頡剛的古史考辨思想，受到鄭樵、姚際恆、崔述等三位古人，和胡適、錢玄同兩位同時代學者的影響。關於顧頡剛與鄭樵、姚際恆、崔述和胡適等人的關係，學者已有多篇論文加以論述^②，唯獨他與錢玄同的關係學者尚未加以關注。為釐清兩人論學的內容，及顧頡剛所受到的影響，仿本人所作〈顧頡剛與鄭樵〉、〈顧頡剛與姚際恆〉等文之撰寫方式，草成此文。希望將來能有機會把所撰諸文輯成《顧頡剛的學術淵源》一書。

二、論古書辨偽問題

顧頡剛最早和錢玄同接觸的時間，相關的文獻並沒有記載。從民國九年（1920）起，胡適和顧頡剛就開始蒐集姚際恆的相關著作，並開始點讀姚際恆

① 見《文史哲學者治學談》（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1月），頁82-112。

② 關於顧頡剛與鄭樵的，有筆者撰：〈顧頡剛與鄭樵〉，《泰安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1999年3月）。關於顧頡剛與姚際恆的，有筆者撰：〈姚際恆與顧頡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5期（1999年9月），頁431-458。關於顧頡剛與崔述的，有：(1)路新生撰：〈崔述與顧頡剛〉，《孔孟學報》第64期（1992年9月），頁135-156。又發表於《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1993年8月），頁61-76。(2)邵東方撰：〈論胡適、顧頡剛的崔述研究〉，收入邵氏著：《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頁205-292。關於顧頡剛與胡適的，有：(1)杜蒸民：〈胡適與古史辨派〉，《安徽史學》1998年第1期，頁49-55。(2)季維龍：〈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關係和學術情誼〉（上），《徽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51-57。（下）《徽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頁58-65。

的《古今僞書考》。在民國十年（1921）錢玄同給胡適一封信，大概談到將辨僞書從王充起至崔適止，編集在一起。顧頡剛到胡適家，見到錢玄同的這封信，就在民國十年（1921）一月二十一日跟錢玄同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題名為〈論辨僞叢刊分編分集書〉。內容可分成爲兩方面，一是編輯辨僞叢刊事，顧氏的信說：

昨天在適之先生處見到先生的信，說辨僞書從王充起（剛意可以從《七略》起）至崔適止，總集攏來，這件事我很贊成。我以爲現在著手的幾種可以稱做《辨僞叢刊》第一集，將來再集到十萬字的左右時，做二集、三集，如先生標點的《僞經考》，便可獨居一集。這樣辦法，先生以爲如何？^③

顧頡剛想編輯辨僞叢刊，想把已著手進行的幾種，稱做《辨僞叢刊》第一集，將來再編二、三集。把這種做法向錢玄同徵詢意見。另一方面是討論辨僞時，是專在「僞書」上或并及於「僞事」？顧頡剛的信說：

我有一個疑問，我們的辨僞，還是專在「僞書」上呢？還是并及於「僞事」呢？像《論衡》，雖有〈書虛〉等篇，而他所疑的，乃是不當有此事實，並不是說這本書是僞，所以采及《論衡》便是辨及「僞事」。這樣做法，範圍放得大些。我們或者拿辨「僞事」的算做《辨僞叢刊》的「甲編」，辨「僞書」的算做「乙編」，《論衡》這部書，就可算做甲編的第一集，先生以爲何如？^④

這一部分，顧頡剛請教錢玄同，所謂辨僞是專在辨「僞書」，還是要兼及「僞事」，如果兼及僞事，就可以把辨「僞事」的算做《辨僞叢刊》的「甲編」，辨「僞書」的算做「乙編」，並打算將《論衡》這部書算做甲編的第一集。錢

^③ 見顧頡剛編著：《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3月重印本），第1冊，頁23。

^④ 《古史辨》，第1冊，頁23。

玄同接到顧頡剛的信後，於一月二十七日回了一封信，題名為〈論近人辨偽見解書〉。信中提到前代學者真可憐，天天在讀偽書，死而不寤。他強調辨偽的目的「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他舉有關孔子的事說：

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大同」之義，「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卻不可認為真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或《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記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⑤

這段話在強調，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書中的「大同」之義，「三世」之說，都不可認為是真孔學。如果《墨子·非儒篇》、《莊子·盜跖篇》不但非偽書，且所記是實錄，我們也不必為孔子的行為避諱。

至於顧頡剛所問，辨偽是專在辨「偽書」或并及於「偽事」？錢玄同的回答是：

我以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偽事」比辨「偽書」尤為重要。崔東壁、康長素、崔觶甫師諸人考訂「偽書」之識見不為不精，只因被偽事所蔽，儘有他們據以駁「偽書」之材料，比「偽書」還要荒唐難信的。^⑥

錢玄同強調辨「偽事」比辨「偽書」更為重要，崔述、康有為、崔適等人考訂「偽書」的識見甚為精到，但因被「偽事」所蔽，用以駁「偽書」的材料，比「偽書」還荒唐難信。錢玄同舉了三個例子為證：

⑤ 同前註，頁24。

⑥ 同前註。

- (1)康長素《孔子改制考》中攻擊劉歆所說孔子作六經之旨，而自己乃引「緯書」來說孔子作六經之旨。
- (2)夏穗卿《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中明明說秦漢儒生糅合方士之言為非孔學之真，而反以桓譚、張衡之闢圖讖為非。
- (3)崔解甫師《春秋復始》斥《左氏》、《穀梁》二傳後出，其事實不足信，顧反尊信比《左》、《穀》更後出之何休之說。（何休《公羊解詁》中「測之史事，崔師皆信之。」）^⑦

由這三個例子，他認為辨「偽事」比辨「偽書」更為重要。像孟子之疑〈武成〉、《韓非子·顯學篇》、《論衡》之〈書虛〉、〈藝增〉，《史通》之〈疑古〉、〈惑經〉等疑古材料應蒐羅齊備，擇要擇善點校印行，實「有功藝林不淺」。

顧頡剛於一月二十九日給錢玄同回了信，題名為〈論辨偽工作書〉。他強調以「文氣」、「文格」來辨偽並不確實，錢玄同對音韻文字之學很有研究，如能從文法上去考究，真不知道可以發現多少偽迹！對於錢玄同批評康有為等人所以辨偽成果不佳，顧頡剛也作了解釋：

先生說康有為一輩人考訂偽書的識見不為不精，然而反信了讖緯，尤其荒唐難信。我想，讖緯之為偽造，康、夏等亦未嘗不「心知其意」，但有了一個「今文學家」的成見橫梗胸中，不能不硬擺架子罷了。這種的辨偽根本先錯了。^⑧

顧頡剛認為康有為、夏曾佑所以引用讖緯，是因有今文學家的成見橫梗胸中，所以才如此。顧頡剛並告訴錢玄同，辨「偽事」的，各家文集及筆記中常看得見。若是每人每月各人看三、四部書，隨時摘出，一年總可出幾本^⑨。

^⑦ 《古史辨》，第1冊，頁24-25。

^⑧ 《古史辨》，第1冊，頁26。

^⑨ 同前註。

民國十年（1921）三月二十三日，錢玄同跟顧頡剛回信，題名〈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信中討論兩件事，一件是論今古文經學，另一件是論辨偽叢書事。關於辨偽叢書，錢玄同曾聽胡適說過顧頡剛開過《辨偽叢書》的書單，但已找不到。要求顧頡剛再抄一份給他。另外，錢玄同以為《辨偽叢書》中，除專著《考信錄》、《偽經考》等專書以外，可將文集、筆記裏關於辨偽文字裁篇別出，編成「辨偽叢著」，也作為「辨偽叢書」中的一種。錢玄同並舉例說，如《論衡》之〈儒增〉、〈藝增〉、〈書虛〉、〈正說〉，《史通》之〈疑古〉、〈惑經〉，朱晦庵之〈詩序辨說〉，章太炎之〈徵信論〉等，可合為一編，列為《辨偽叢書》之一。

四月二日顧頡剛回了信，題名為〈答編錄辨偽叢刊書〉，對錢玄同所述作了積極的回應。錢玄同要求提供《辨偽叢書》目錄，顧也重抄了一份。信中又說到，所謂辨偽，約有三方面：一是偽理，二是偽事，三是偽書。其中「偽理」一部分本沒有一定標準，可以不必管他。又以為上次信中，曾舉《論衡》全書為《辨偽叢刊》甲編之一，實在是當時疏忽，感謝錢玄同之糾正。因《論衡》大都是辨「偽理」，這種是非，要請哲學科學家來判斷，若把它拉攏在內，則《荀子》的〈非相〉、《墨子》的〈非命〉也要拉進來，不勝其繁，錢玄同把這方面刪去，專就「偽事」、「偽書」兩方面著手，令人敬佩^⑩。

信中又提到，以前曾想把《辨偽叢刊》分為兩編，甲編辨「偽事」，乙編辨「偽書」。顧頡剛認為此種觀點也有不對的地方，因為像《考信錄》是辨「偽事」的，內中也有辨「偽書」；《偽經考》是辨「偽書」的，內中也有辨「偽事」。所以，主張把兩編打通，不設什麼界限。另外，顧頡剛對於錢玄同所說將各家文集或筆記中關於辨偽的文章裁篇別出，稱為「辨偽叢著」，則以為不必要，像《學海堂經解》那樣，不論全載的或刪節的，都在一個名目下即

^⑩ 《古史辨》，第1冊，頁32。

可^①。書信之外，另附有〈擬辨偽叢刊條例〉五條及顧氏所擬《辨偽叢書》目錄。

三、論六經的性質問題

錢玄同處於今古文之爭餘波盪漾的時代，他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時，拜章太炎為師，又於宣統三年（1911），在故鄉吳興，向崔適請業。所以，對今古文都有深刻的認識。民國十年（1921）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給顧頡剛的信，〈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中，自述他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間頗宗今文家言。一九〇九年讀了劉逢祿和龔定庵之書，才背叛章太炎而宗今文家言，但也只是排斥《左氏傳》而已，對《古文尚書》、《毛傳》，並不在排斥之列。而魯恭王得壁經一事，也不疑其為子虛烏有。自一九一一年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崔適的《史記探源》兩部書以後，才開始專宗今文。這是錢氏自述他專宗今文學的經過。錢氏又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因為變法而作，而崔適篤信今文過於天帝。他們兩人，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但錢氏仍相信他們的考證精當者居多。錢氏又自述他有關今古文的看法說：

我前幾年對於今文家言是篤信的，自從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為劉歆偽作，則至今仍依康、崔之說，我總覺得他們關於這一點的考證是極精當的。我現在以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真相的，兩者都難憑信，不過比較起來，還是今文較可信些。咱們若欲知孔學之真相，僅可於《論語》、《孟子》、《荀子》、《史記》諸書求之而已。^②

^① 《古史辨》，第1冊，頁33。

^② 《古史辨》，第1冊，頁30-31。

錢氏從一九一七年以後思想改變，以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真相，兩者都不可相信。他認為要了解孔學真相，僅可從《論語》、《孟子》、《荀子》、《史記》等書中求。

討論辨偽時，不免要涉及群經的辨偽問題。在民國十年（1921）十一月五日錢玄同給顧頡剛的〈論編纂經部辨偽文字書〉裏，特別強調經部辨偽之重要：

我以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麼，總要徵引它、信仰它，故「偽經辨證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⑬

錢氏認為經書本來就被看重，大家徵引、信仰它，所以要編「經部辨證集說」來戳破它的假面具。他並指導顧頡剛，這部書應該怎麼編錄。他提出的原則有二，一是「後人用前人成說者，若全襲前人，毫無增加，即不必錄；若稍增加，則選錄增加之一部分」。例如康氏《偽經考》，辨《逸禮》的全襲邵位西（邵懿辰），則單錄邵說可也。康氏辨《春秋》，以《左傳》之「五十凡」等為劉歆所附益，乃全襲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則但錄劉氏之說已足。而說《左傳》本是《國語》之一部分，不但不名《春秋左氏傳》，就是《左氏春秋》這個名目也是本來沒有的，此為康氏所發明，應該選錄，列劉說之後。二是「前人但隱約其詞，且無明確之證據，而後人辨駁精當，突過前人的，則略載前說而詳錄後說」，例如辨《毛詩》之偽，以康氏為最明快，應全錄其說，康氏以前亦有疑《毛序》之文，則略載較精采者已足。

當日顧頡剛收到信，即給錢玄同回信，題名〈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

^⑬ 《古史辨》，第1冊，頁41。

作偽書書〉。顧氏認為如果這本經部辨偽的書完成，便可能進一步推翻「孔子刪述六經」這句話。顧氏本來就不贊同孔子刪述六經，他在這信裏，對這問題表示了意見。他說：

六經自是周代通行的幾部書，《論語》上見不到一句刪述的話。到孟子，才說他作《春秋》，到《史記》才說他贊《易》、序《書》、刪《詩》，到《尚書緯》，才說他刪《書》，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說他作《易經》、《儀禮》。總之，他們看著不全的，指為孔子所刪，看著全的，指為孔子所作。其實，看劉知幾的〈惑經〉，《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豈非太不能使「亂臣賊子懼」了嗎？看萬斯同的疑《今文尚書》及《詩三百篇》，《書》、《詩》若果是孔子刪的，孔子真是獎勵暴君，提倡淫亂了。看章學誠的〈易教〉，《儀禮》倘果是孔子作的，孔子也未免僭竊王章了。「六經皆周公之舊典」一句話，已經給今文家推翻；「六經皆孔子之作品」一個觀念，現在也可駁倒了。^⑭

他認為歷來大家把刪經、作經的事全附會在孔子身上，從劉知幾、萬斯同、章學誠等人的論辨，可以證明前人說法大多是附會。六經既非周公之舊典，也非孔子之作品。

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二十五日顧頡剛給錢玄同寫信，說到要為《國學季刊》為文，題目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並申述其內容。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錢氏作了〈答顧頡剛先生書〉，除贊同顧氏的「古史層累說」外，大部分的篇幅在論述六經的性質。他自述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的《偽經考》和崔適的《史記探源》，知道古文經是劉歆等人偽造。後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之八九是儒家的託古，沒有信史的價值。又看了葉適的《習學記言》、萬斯同的《群書疑辨》、姚際恆的《詩經通論》

^⑭ 《古史辨》，第1冊，頁41-42。

和《禮記通論》、崔述的《考信錄》等書，才知道六經本非周公之政典，也非孔子託古之著作。既無信史的價值，也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錢氏對六經的形成，作了如下的推論：

- (1) 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
- (2) 《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
- (3) 把五部書配成六經，是因《論語》中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加上孟子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惟何以配入《易經》，並不明白。
- (4) 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
- (5) 自從六經之名成立，許多古書，每一道及，總是六者並舉。^⑮

錢氏又認為要考究孔子的學說和事蹟，《論語》的資料最可信。他統計《論語》中引到各經的次數是：

- (1) 引《詩》有十八則。
- (2) 引《書》有四則。
- (3) 引樂有六則。
- (4) 引《易》有三則。
- (5) 總說有三則。^⑯

關於禮的話，《論語》中雖然最多，但大都是論禮意的，和《儀禮》全不相關。關於《春秋》的話，一句也沒有。錢氏對《論語》所引各經的條目，一一加以分析，最後的結論是六經與孔子無涉，也就是孔子既沒作六經，也沒刪經書。

^⑮ 《古史辨》，第1冊，頁69-70。

^⑯ 《古史辨》，第1冊，頁71。

那麼，六經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書？錢氏認為：

- (1)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詩，大部分是東周的詩。
- (2)書：似乎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它為歷史。
- (3)禮：《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周禮》是劉歆偽造的^①。
《兩戴記》中，十分之九都是漢儒所作的。
- (4)樂：樂本無經，而古文家造出竇公獻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之說，是想冒充「樂經」。
- (5)易：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乾、坤二卦是兩性生殖器的記號^②。
- (6)春秋：王安石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是「流水賬簿」，都是極確當的。

錢氏認為「六經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但因孟子的表彰，兩千年中，除劉知幾外，沒有人敢懷疑它。又認為兩千年中學者研究六經，以漢儒為最糟。他們不但真偽不辨，且還作偽。清儒以為漢儒去先秦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實在是上了漢儒的當。

① 錢玄同對《儀禮》和《周禮》的看法，都不正確。《儀禮》的作者唐代時出現周公所作的說法，清代今文學興起，出現孔子手定的說法。這些說法，都不足信。一般以為《儀禮》是戰國時之作品，並非偽書。《周禮》的作者，眾說紛紜，但自錢穆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周官著作時代考〉二文後，已很少人相信是劉歆偽作。

② 原始的《易》卦是取法於什麼，尚無定論。屈萬里先生以為受龜腹甲的啓示。屈先生有〈易卦源於龜卜考〉，見《書備論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7月，《屈萬里全集》第14冊），頁48-69。近來出土不少數字卦的符號，都可證明易卦非生殖器崇拜。相關論文有：(1)徐錫台、樓宇棟：〈西周卦畫試說——周原卜甲上卦畫初探〉，《中國哲學》第3輯（1980年8月），頁13-19。(2)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1980年10月），頁403-416。(3)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中國哲學》第14輯（1988年1月），頁1-15。(4)戴璉璋：〈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國文天地》第3卷第9期（1988年2月），頁26-29。

四、論《詩經》和《春秋》真相問題

在討論群經問題時，必然會涉及個別的經書。因為歷來都是將六經當作爲聖經看待的，《詩經》和《春秋》也是如此。就《詩經》來說，詩中含有聖人的道德教訓在內。顧頡剛則極力撇清孔子與《詩經》的關係，認爲《詩經》只不過是當時的歌謠而已。爲了證明《詩經》與孔門沒有關係，顧頡剛將反傳統的《詩經》著作，加以輯佚和整理，當時正在著手的是輯錄鄭樵的《詩辨妄》。

民國十一年（1922）二月十九日，顧頡剛給錢玄同寫信，題名爲〈論詩經歌詞轉變書〉，信中提到《詩辨妄》輯錄的情形，希望錢玄同能爲該書作一篇序。另外，顧頡剛說他想作一篇〈歌謠的轉變〉的文章，說明〈唐風〉中的〈杕杜〉和〈有杕之杜〉同是一首乞人之歌；〈邶風〉中的〈谷風〉和〈小雅〉中的〈谷風〉同是一首棄婦之歌；〈小雅〉中的〈白駒〉和〈周頌〉中的〈有客〉同是一首留客之歌。這些都是一首的分化，不是各別的兩首¹⁹。顧氏認爲由此也可以證明〈風〉、〈雅〉、〈頌〉只是大致的分配，並沒有嚴密的界限²⁰。

二月二十二日錢玄同給顧頡剛回了信，題名〈論詩經真相書〉，提到他很願意爲《詩辨妄》作〈序〉，〈序〉的內容打算要寫出下列三點：

- (1)《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麼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干，不過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
- (2)研究《詩經》，只應該從文章上去體會出某詩是講的什麼。至於那什麼

¹⁹ 後來，鄭振鐸用這種方式來分析《毛詩序》詩旨之不合理，見鄭氏撰：〈讀毛詩序〉，《小說月報》14卷1期（1923年1月）。

²⁰ 《古史辨》，第1冊，頁46。

「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詩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只好闕而不講；一況且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底本身無關，儘可不去理會它。

(3)將毛學究、鄭猷子底文理不通處舉出幾條，「昭示來茲」。^②

這三點，其實有很重要的意義，如以為《詩經》根本不是聖經，與孔子也全不相干，研究《詩經》應從文章上去體會某詩的意思，不必去管言外之意。嘲諷毛公為毛學究，鄭玄為鄭猷子，即表示對他們的說法表示不屑。這幾項說法，基本上成為後來《古史辨》學者的指導思想。

經過將近一年，在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九日，錢玄同向顧頡剛寫了〈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信中認為這一年中所見顧頡剛「東鱗西爪」之詩說，覺得無一不好。希望顧氏能將《詩經》好好地整理一番。「救詩於漢宋腐儒之手，剝下它喬裝的聖賢面具，歸還它原來的文學真相。是很重要的工作」。在信中特別提到牟庭有《詩切》一書，未刊行。但牟庭的兒子牟房刻《雪泥屋遺書目錄》，把〈詩切序〉和〈詩篇義〉刊在裏面，錢氏準備把這兩部分標點印行。錢氏又提到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十五冊〈桃花聖解盒日記·丁集〉中把牟氏的著作大罵一頓，內容是：

- (1) 獸人之學，盡棄古說，專任臆斷，持論不根。
- (2) 嚮壁虛造，無所取資，恃其精心，敢於立異。
- (3) 夜郎自大，恣意肆言，卒為學究之儉荒，經儒之梟賊。^②

專門批評《詩切》的話，則說：「痛攻《毛詩》，悉反《小序》，甚至改定篇名，蓋近病狂之言。」又舉牟氏新說三十餘條，目為「風狂囈語，名教罪

^① 《古史辨》，第1冊，頁46-47。

^② 《古史辨》，第1冊，頁51。

人」。錢氏認為李慈銘是見解極淺略的人，逆揣牟氏書中必多精義。他看了〈詩切序〉和〈詩篇義〉，果然有很多新穎的議論。認為「不讓姚際恆底《詩經通論》，方玉潤底《詩經原始》與龔橙底《詩本誼》，而且比姚、方與龔三人還要大膽」^{②③}。

二月二十五日，顧頡剛在上海，他給錢玄同回了信，題名為〈論詩經經歷及老子與道家書〉，說到鄭振鐸要他做一篇《詩經》的論文，他擬定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的題目。認為《詩經》的厄運是：

- (1) 戰國時詩失其樂，大家沒有歷史的知識，而強要把《詩經》亂講到歷史上，使得《詩經》的外部蒙著一部不自然的歷史。
- (2) 刪詩之說起，使《詩經》與孔子發生了關係，成了聖道王化的偶像。
- (3) 漢人把三百五篇當諫書，看得《詩經》完全為美刺而作。
- (4) 宋人謂淫詩宜刪，許多好詩險些兒失傳。^{②④}

所謂《詩經》的幸運，顧頡剛是指：

- (1) 詩篇有了一個結集，不致隨許多逸詩一齊亡了。
- (2) 漢人不當它尋常的詩歌看，所以《漢書·藝文志》中許多歌詩完全亡失，而此巍然僅存。
- (3) 宋代歐、鄭、朱、王輩肯求它的真相，不為傳統的解釋所拘；雖然蒙蔽之處還是很多，到底漏一線曙光。
- (4) 到現在可以一點沒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相表顯出來了。^{②⑤}

顧頡剛說他做了半個月，只做完第一項的厄運，計分五節，即：(1)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2)周代人的用詩；(3)孔子對於詩樂的態度；(4)戰國時的詩樂；(5)孟子說詩。他自認這篇文章解決了幾個問題，但匆忙間恐免不了錯誤。

^{②③} 同前註。

^{②④} 《古史辨》，第1冊，頁53。

^{②⑤} 同前註。

除了討論《詩經》中的問題外，民國十四年（1925）三月十六日，錢玄同寫信給顧頤剛，題名為〈論春秋性質書〉，請教有關《春秋》的問題，錢氏認為《春秋》只有兩個絕對相反的說法可以成立：

- (1)認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蘊藏著許多「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當依《公羊傳》及《春秋繁露》去解釋它。這樣，它絕對不是歷史。
- (2)認它是歷史。那麼，便是一部魯國底「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這樣，便決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孟子書中「孔子作春秋」之說，只能認為與他所述堯、舜、禹、湯、伊尹、百里奚底事實一樣，不信任它是真事。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麼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²⁶

錢玄同認為他近年來是主張後一說的，也就是主張《春秋》不是孔子所作。

三月二十一日，顧頤剛作了回信，題名〈答書〉。顧氏認為他對《春秋》經的意見，和錢玄同相同，顧氏提出六點理由：

- (1)《論語》中無孔子作《春秋》事，亦無孔子對於「西狩獲麟」的歎息的話。
- (2)獲麟以後定為「續經」，沒有憑據。《春秋》本至「孔丘卒」，儒者因如此則不成為孔子所作，所以揀了一段較為怪異的記載——獲麟——而截止。以為此前為孔子所作，孔子所以作《春秋》是為了「感麟」，此後便為後人所續。
- (3)如果處處有微言大義，則不應存「夏五」、「郭公」之闕文。存闕文是史家之事。

²⁶ 《古史辨》，第1冊，頁275-276。

(4)《春秋》為魯史所書，亦當有例，故從《春秋》中推出些例來，不足為奇。

(5)《春秋》中稱名無定，次序失倫，如果出於一人之手，不應如是紊亂。

何況孔子的思想是有條理的，更何至於此。可見其出於歷世相承的史官之手。

(6)孟子以前無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話本是最不可信。^{②7}

此外，顧氏又對何以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提出自己的看法：

(1)《春秋》為魯史官所記的朝報。這些朝報因年代的久遠，當然有闕文，又因史官的學識幼稚，當然有許多疏漏的地方。

(2)孔子勸人讀書，但當時實無多書可讀，《詩》、《書》是列國所共有的，《易》與《春秋》是魯國所獨有的，均為後學者所讀之書。

(3)《春秋》當然不至「孔丘卒」而止，但因儒者的尊重孔子，故傳習之本到這一條就截住了。如此，《春秋》就鬚鬚是儒家所專有的經典了。

(4)《春秋》成為儒家專有的經典之後，他們尚不滿意，一定要說為孔子所作。於是又在「西狩獲麟」截住，而說孔子所以作《春秋》是出於「傷麟感道窮」。

(5)自有此說，於是孟子等遂在《春秋》內求王道，公羊氏等遂在《春秋》內求微言大義。經他們的附會和深文周納，而《春秋》遂真成了一部素王手筆的經典。^{②8}

顧氏並不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而是要說明《春秋》所以成為儒家經典，又成為孔子著作的經過^{②9}。

②7 《古史辨》，第1冊，頁276-277。

②8 《古史辨》，第1冊，頁277-278。

②9 《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正反意見極多。肯定《春秋》為孔子所作，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張以仁先生所著：〈孔子與春秋的關係〉，收入張先生撰：《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1月），頁1-59。

民國十四年（1925）九月二十二日，錢玄同才跟顧頡剛回信，題名〈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例書〉。信中提到《春秋》中獲麟以後的「續經」並非魯史之書，是劉歆偽造的。然後討論到《左傳》和《國語》的關係，錢氏認為「《左傳》是真書，但它是《國語》底一部分，並非《春秋》的傳」，並舉例比較兩者之關係。可見錢玄同這一方面的想法，頗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影響。

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七日，錢玄同為顧頡剛點校的《左氏春秋考證》作〈左氏春秋考證書後〉，說到他早年看了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就不信任《左傳》。他認為一百年來的今文學運動是近代學術史上極為光榮的事，它的成績有兩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二是偽經和偽史料的推翻。錢氏認為偽經的推翻，劉氏的《春秋左氏考證》是第一部，自此書出版以後，考辨偽古文經的著作相繼出現，至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偽經之公案才定讞。可見錢氏肯定劉逢祿《春秋左氏考證》有先推倒古文經的功勞。

五、論古史層累說

「古史層累說」是古史辨學派的中心思想，對近代中國史學產生巨大的影響。可是這古史層累的觀念，是從顧頡剛與錢玄同的通信中，慢慢形成的。

民國十年（1921）一月二十一日，顧頡剛給錢玄同的〈論辨偽叢刊分編分集書〉，問到辨偽是專在「偽書」上，還是要并及「偽事」？一月二十七日，錢玄同給顧頡剛的回信〈論近人辨偽見解書〉中，明確的告訴顧頡剛，辨偽事比辨偽書更重要。偽事是指古書中所記載不實的事蹟。後來，顧頡剛所提出的古史層累說，應該溯源到他們兩人這次的通信。

民國十年（1921）十一月五日，顧頡剛給錢玄同的〈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偽書書〉，信中提到戰國人不但造偽事，也造偽書。他以舜作為例子，舜在孔子時只是個沒有事蹟的古帝，門弟子問孝的這般多，孔子絕沒有說到舜身上，可見舜在那時還沒有孝的名望。孔子之後，有人做了一部〈堯

典》，說了「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的話，舜也成了孝子。到孟子時，大家更造了他許多孝蹟，「焚廩捐階」是他，「號泣旻天」是他，「五十而慕」是他，「不告而娶」是他，「夔夔齊慄」是他，甚而代他解決「瞽瞍殺人」的問題，可見他當時已成了孝的楷模^⑩。顧氏這段話是強調舜有關孝的事蹟，是慢慢附加上去的，就是古史是層層累積的。只是沒有提出「古史層累」的名詞而已。

同年十一月八日，顧頡剛又給錢玄同寫了〈論堯舜伯夷書〉，信中提到，《論語》中說堯是「蕩蕩乎民無能名」，說舜是「無爲而治」，都是沒有事蹟而加美之辭。恐怕在孔子時，堯、舜原不過是「若存若亡」的兩個古帝。因無事蹟，只可說「無能名」和「無爲」。又舉伯夷、叔齊爲例，《論語》中稱伯夷、叔齊凡四次：一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一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云「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一則排在「逸民」類中，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從這四段話，可知伯夷、叔齊頗似個隱士。所謂「餓於首陽」，猶云「食貧於首陽」，但後來的人把「餓」看得太著實了，以爲一定是餓死，於是造出「義不食周粟」的話來。這件故事越說越多，於是伯夷、叔齊成了殷朝的忠臣，沒有《論語》中逸民的氣息了^⑪。在這封信的末尾，顧氏又說：

我很想把古史分析開來，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紀事以著書之時代爲次，看他如何漸漸的轉變，如何漸漸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記了，使得作偽之迹無可遁形。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⑫

顧氏以堯、舜、伯夷、叔齊爲例，說明他們的事蹟是慢慢附上去的，又要作表來看古事如何漸漸的轉變，也就是古史是如何層層的累積而成。至此，古史層

^⑩ 《古史辨》，第1冊，頁42。

^⑪ 《古史辨》，第1冊，頁43-44。

^⑫ 《古史辨》，第1冊，頁44。

累說已呼之欲出。

錢玄同曾經要求顧頡剛為《國學季刊》寫文章，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二十五日，顧頡剛在給錢玄同的〈論詩經經歷及老子與道家書〉中說：「先生囑我為《國學季刊》作文，我也久有這個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³³在這封信裏，顧氏正式宣布了他的「古史層累說」。同一天，顧氏又給錢玄同一封信，敘說他的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大意。

顧氏以為西周以至春秋初年，對於古史並沒有悠久的推測，〈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他們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觀念。他們只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在這種始祖的觀念之外，顧氏認為還有一個「禹」，禹最早見於〈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從這詩，可知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到〈魯頌·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繼禹之緒。」從這詩，可知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詩中為什麼不說后稷繼黃帝之緒，繼堯舜之緒？這是因為那時沒有黃帝、堯、舜，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繼禹之緒。

顧氏又以為禹和夏並沒有什麼關係，禹和桀所以發生關係，是從九鼎而來。禹，《說文》云：「蟲也，從內，象形。」內，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禹或是九鼎上所鑄的一種動物。九鼎是夏所鑄的，商滅了夏，把鼎搬到商，周滅了商，就搬到周。凡是興國皆以九鼎為信物，這樣夏、商、周就聯成一系。商不得不做桀的臣子，文王不得不

³³ 《古史辨》，第1冊，頁56。

做殷紂的臣子。由於禹出於夏鼎，就以爲禹是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③④}。這封信，除考辨禹的來源外，也再提到堯、舜事蹟的演變，和以前顧氏的信裏所說很相近。

民國十二年（1923）四月二十七日，顧氏爲這封信加了一篇〈序〉，把信和〈序〉一起刊在五月六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九期。在這篇〈序〉中，又提到要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來詳述傳說中古史的演變經過。顧氏在這篇〈序〉中表達了他這篇論文的構想：

- (1)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 (2)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 (3)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③⑤}

這三點至少已說明古史層累說的大概內容和用意。顧氏在這封信中又以爲〈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題目的範圍太大了。想分作〈戰國以前的古史觀〉、

^{③④} 顧氏此一說法，當時受到相當的質疑，如(1)劉揆藜撰：〈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收入《古史辨》，第1冊，頁82-92。(2)胡堇人撰：〈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收入《古史辨》，第1冊，頁92-96。顧頡剛有答書，收入《古史辨》，第1冊，頁96-102，頁105-198。(3)柳詒徵撰：〈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收入《古史辨》，第1冊，頁217-222。顧氏答書，收入《古史辨》，第1冊，頁223-231。

^{③⑤} 《古史辨》，第1冊，頁60。

〈戰國時的古史觀〉、〈戰國以後的古史觀〉三個題目來說。

民國十二年（1923）五月二十五日，錢玄同向顧頡剛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題名〈答顧頡剛書〉，後來刊在六月十日的《讀書雜誌》第七期中。信的開頭說：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為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歎，希望先生用這種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所蒙。^{③⑥}

這些贊美之辭。對顧頡剛的古史考辨工作，應有相當的激勵作用。接著，錢玄同自述他對堯、舜、禹的看法。他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堯、舜的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的歷史應從禹說起。但讀了顧頡剛的信，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了。雖然如此，錢玄同並不贊同顧氏所說，禹是蜥蜴的觀點，他說：

先生據《說文》云「從內」，而想到「內」訓「獸足蹂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說文》中從「內」的字，甲文、金文均不從「內」（如「禽」、「萬」、「罌」、「獸」），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之「內」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③⑦}

可見，兩人在論學的過程中，雖然理念一致，但細節問題仍舊有所出入。儘管如此，從他們書信來往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這樣說，震撼近代史學界的「古史層累說」是顧頡剛受錢玄同的啟發後，慢慢醞釀出來的。前人討論古史層累說時，只知有顧頡剛，而不提錢玄同的啟導之功，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

^{③⑥} 《古史辨》，第1冊，頁67。

^{③⑦} 《古史辨》，第1冊，頁69。

六、結 論

從上文的分析討論，可得下列數點結論：

其一，古史辨學者治學的目的，是藉考辨古籍來了解古史的真相。從他們兩人的書信來往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要編《辨偽叢刊》，將辨偽由辨「偽書」擴及「偽事」，且錢玄同認為辨「偽事」比「偽書」更重要。像《論衡》中的〈儒增〉、〈藝增〉、〈書虛〉、〈正說〉，《史通》中的〈疑古〉、〈惑經〉，朱子的〈詩序辨說〉，章太炎的〈徵信論〉，這些以辨「偽事」爲主的文章，都應裁篇而出，加以標點，並輯爲一書。由於他們重視書中的偽事，對古籍中所記載的種種事實，重新加以審視，不但發現了古籍的眞面目，也爲後來的古史層累說提供了靈感。

其二，在考辨古籍的過程中，他們努力去探求六經的真相，推翻「孔子刪述六經」的觀點。顧頡剛認爲大家把刪經、作經的事全附會到孔子身上，從劉知幾、萬斯同、章學誠等人的論辨，可知六經既非周公之舊典，也非孔子之作品。錢玄同分析的結果，《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尚書》是文件類編。《儀禮》是戰國時代鈔成的偽書，《周禮》是劉歆偽造，《兩戴記》十分之九是漢儒所作。《樂》本無經。《周易》是原始生殖器崇拜。《春秋》是「斷爛朝報」、「流水賬簿」。所有的經書都與孔子無關，書中並無微言大義，而是有待整理的史料而已。他們對六經的觀點，有部分受今文學派的影響，有些是個人的偏見。在他們觀點的影響下，經學史學化，也影響了經學往後的發展。

其三，在他們兩人往返的書信中，對《詩經》和《春秋》的真相有較深入的討論。錢玄同認爲《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詩歌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的性質相同，根本不是聖經，和孔子也沒什麼相關。詩中如有「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言外之意，因與藝術無關，可以不必理會。顧頡剛作了〈詩經的厄運與幸運〉，認爲

《詩經》有四大厄運，也有四大幸運。最大的厄運是與孔子發生關係，成了聖道王化的偶像。他們認為《春秋》並非孔子所作，除討論《春秋》的性質外，並推斷孔子作《春秋》這一說法形成的過程。經近代學者的研究，《詩經》經孔子整理過，《春秋》是孔子據魯史增刪而成，證據都相當確鑿，顧頡剛和錢玄同兩人的觀點恐無法成立。

其四，在他們兩人討論辨偽的過程中，錢玄同認為辨「偽事」更為重要，這使他們注意到古書所載人物事蹟的正確性。起先，顧頡剛從考究舜的事蹟開始，以為舜本是沒有事蹟的古帝，後人慢慢把事蹟加上去，竟成了孝子的楷模。接著又考究堯、伯夷、叔齊等人，也都如此。在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二十五日給錢玄同的信中提出要作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正式向世人宣布他的「古史層累說」。在信中他認為禹是蜥蜴，馬上引起很大的反響。顧氏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也愈放愈大」。這就是他的古史層累說的中心思想。今人提到古史層累說，都認為是顧頡剛的創見，從他們兩人來往的書信，可知顧氏是受錢玄同的啓發而來。

顧頡剛與錢玄同

林慶彰

提 要

本文從錢玄同和顧頡剛來往的書信中去探討兩人對傳統學術問題的看法。在論古書辨偽方面，錢玄同認為辨「偽事」比辨「偽書」重要，勸顧頡剛應將古書中辨「偽事」的篇章輯為一書，這個想法給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不少靈感。在論六經性質方面，他們既不宗古文，也不宗今文，兩人都認為，孔子既未作六經，也未刪經。在討論《詩經》和《春秋》真相問題方面，認為《詩經》只不過是詩歌總集，根本不是聖經，讀《詩經》應從文章上去體會。《春秋》並非孔子所作，《左傳》則是《國語》的一部分。在討論古文層累說方面，顧頡剛以堯、舜、伯夷、叔齊為例，認為他們的事蹟本來都很少，後來才慢慢附加上去，所以古史往往是層層累積的，這就是著名的「古史層累說」。他們對某些學術問題的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但可以看出當時學術思想變動的軌跡。

Ku Chieh-Kang and Ch'ien Hsuan-T'ung

Lin Ching-cha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ien Hsuan-t'ung's and Ku Chieh-kang's views on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s revealed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In investigating ancient texts and their authenticity, Ch'ien Hsuan-t'ung thought that identifying "false events"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dentifying "false texts." He encouraged Ku Chieh-kang to collate sections of ancient texts that identify false events and publish them as a book-length study. This idea provided much inspiration for Ku's "layer accretion" theory of ancient history. In their researches on the Six Classics, the two scholars were followers of neither the Old Text nor the New Text school. They believed that Confucius neither composed nor edited the classics.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Shih Ching* and the *Ch'un Ch'iu*, they held that the *Shih Ching* is simply a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songs, not a classic work of the sages. Thus readers should approach the *Shih Ching* simply by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words of the poems, rather than by reading philosophical messages into them. Ku and Ch'ien also held that the *Ch'un Ch'iu* is not the work of Confucius, and the *Tso Commentary* is simply part of the *Kuo Yu*. Ku's renowned "layer accretion" theory of ancient texts grew out of his study of accounts of Yao, Shun, Po Yi, and Shu Ch'i. In early sources, Ku contended, these figures were associated with very few historical deeds; later texts then

gradually embellished and augmented their careers. Ku's hypothesis was that, as these examples show, the content of ancient history typically accumulates in a layer-by-layer fashion. Ku and Ch'ien's views on certain scholarly issues were not completely correct, but they provide fruitful material for tracing developments in the scholarly thought of their time.

Keywords: Ku Chieh-kang Ch'ien Hsuan-t'ung Chinese classics
New Text Old Text *Ku Shih Pien*